

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危机与 劳动教育的时代回应

欧阳广敏¹ 班建武²

(1.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2. 北京师范大学 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 消费社会的出现引发了劳动者地位降低、劳动创造价值被质疑、劳动观念日益式微等诸多问题。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消费社会是一种完全异质于生产社会的社会形态。在消费社会中, 同时作为劳动者与消费者存在的人不仅不能完全摆脱劳动异化, 反而可能陷入资本-权力结构所带来的更加隐秘的、全面渗透生产生活的劳动与消费的双重异化。面对消费社会, 我们必须回归对人的本质的关注, 明确劳动而非消费才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力量。在此意义上, 消费社会中的劳动教育不仅不应因为消费对生产地位的挑战而被弱化, 反而在人的双重异化困境中更彰显其存在的必要性。为此, 消费社会中的劳动教育应当坚定唯物史观, 重申劳动的历史价值; 聚焦人的本质, 明确劳动的现实意义; 注重时代特征, 直面消费社会的挑战。

关键词: 劳动; 劳动教育; 消费社会; 生产社会

中图分类号: B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5) 02-0032-11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 消费的社会意义被空前放大。在鲍曼看来, 在社会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消费活动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与生产社会不同, 消费社会首先要求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①, 其次才是生产者。这样一种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逆转, 抬高了消费的德性。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造成了社会劳动意识的淡薄甚至衰亡。对于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而言, 如何认识消费社会以及消费社会中的劳动与消费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也将直接关系到在这样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 我们如何定位劳动的时代价值, 如何更加有效地实施劳动教育。

一、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危机

消费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 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之一。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②到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③, 从加耳布雷思(今译为加尔布雷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220130)。

作者简介: 欧阳广敏,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教育基本理论; 班建武(通讯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德育原理、劳动教育。

①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新穷人》, 仇子明、李兰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 第64页。

②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凌复华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年, 第55页。

③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 张新木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7页。

思)的“丰裕社会”^①到列斐伏尔的“闲暇社会”^②,消费问题在近代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

1. 消费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

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明确提出“消费社会”这一概念,并获得广泛传播。在他看来,消费社会“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③。从其产生来看,消费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物质相对丰裕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的以生产或生产主义为核心的生产社会不同,消费社会的核心在于消费或消费主义。而这种变化的前提就在于物质或“商品”的相对丰裕。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中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④。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商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减,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也就为全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可供消费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商品的供给甚至超出了人们实际生活的需求,资本需要对消费者进行诱导才能完成对这些剩余商品的消费,为此甚至不惜故意设置“技术缺陷”或“技术性破坏”以扩大消费需求。

在供过于求的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商品的本体功能,而是更加关注其象征价值。这也就形成了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符号消费。在消费社会中,资本“为了保证其社会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统治力进而维持其增殖”,不得不建构出“一种与其运行逻辑相符合的价值体系”。^⑤在这种价值体系的作用下,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满足实际需求,更是那些不断被刺激起来的甚至是创造出来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再是一种“物质实践”,“它既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开的小车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味觉的物质形象和信息来定义的,而是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signifying substance)的组织之中”。^⑥换言之,消费行为就变成了一整套由符号所操控的系统性的行为,而“人类对符号存在的追求与取得荣誉、博取尊重的本能需求紧密相连”^⑦。因此,对于消费者而言,对于商品的占有就意味着对意义符号的占有,商品变成了一种符号的建构,消费也就成为一种意义的追求或身份的确认。

在这种以符号控制为主的消费社会中,形成以超前消费、炫耀性消费等非理性消费为特征的消费文化似乎成为某种必然。在消费社会中,由于对消费的充分鼓动,传统的消费观念逐渐崩溃,应当消费什么、不应当消费什么的传统消费规范、伦理乃至禁忌逐渐解体。特别是在科技发达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大众传媒,对于传统消费观念的消解与新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对消费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它们通过“广告或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引导、推销、刺激民众,使民众的观念与实际生活方式努力符合商业集团的利润需求,尽力朝向附属于商业集团的大众传媒宣传的模式”^⑧。受大众传媒所宣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理念的影响,为了追求所谓的更高身份、地位或阶层的生活或认同,超出自身能力的超前消费以及为了满足虚荣心理的炫耀性消费就在所难免,各种奢侈品、高档服务成为消费者的宠儿。回望现实生活,

① 加耳布雷思:《丰裕社会》,徐世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页。

②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6-39页。

③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④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⑤ 徐水华、张昭:《论消费主义的实质与超越》,《商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⑥ 张天勇:《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符号拜物教的现实根基》,《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

⑦ 曾庆香、苏学良、邱秀聪:《从模拟到表征再到自我指涉——论人类的三种符号崇拜》,《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⑧ 董敬畏:《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实践的阐释》,《桂海论丛》2014年第4期。

规模巨大的商场、遍布城乡的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无孔不入的广告、便捷的购物方式、普遍的信贷消费……消费被不断地引导、刺激，超越了其本身的经济作用与意义，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产与再生产。

2. 消费社会对劳动的挑战

在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甚至一种控制手段，无论是身处其中的消费者还是隐在背后的资本或权力似乎都更加关注消费问题。特别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生产本身似乎显得不再那么重要，生产劳动的地位也随之受到挑战，由此带来了劳动的诸多危机。

首先，消费者身份的提高与劳动者地位的降低。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者与消费者大体是统一的。但在商品经济阶段，特别是从卖方市场转变到买方市场之后，也许人们依然承认劳动与劳动者的基础性作用，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实然上升，而“工作失去了其优越地位”，“也不再是伦理关注的焦点”。^①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区分穷人与富人的标准，“‘正常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消费社会的穷人是无法过正常生活的人，更别说过快乐的生活了”，“穷人境况的本质特点是有缺陷的消费者”，即“失败的消费者”，他们会“面临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②消费者显得更加“高贵”，他们出入高端的消费场所，享受消费带来的满足，而生产劳动者被规训在工位上，甚至是环境极差的工作环境里。不可否认的是，在消费社会中很多人仍然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者，“忍受”工作的痛苦来满足消费的欲望成为许多人的真实写照，消费者与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明显的割裂。更何况还有许多劳动者在工作的同时仍然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消费者”，而另一些人则从事着美食旅行家、国际游学、积木堆砌师、品酒师、酒店试睡员等鲍曼所谓的不从事生产的“娱乐式工作”。

其次，劳动创造价值的经典命题被质疑。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商品则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社会价值的增长是由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但在消费社会中，被符号所控制的消费却使得商品本身的价值与使用价值逐渐弱化，其交换价值或符号价值更加凸显，“劳动创造价值”的经典命题受到挑战。从商品的角度而言，鲍德里亚曾在《物体系》中以“物的零度”来解释商品的状态。所谓物的零度是指商品的一种特殊状态，即功能物。换言之，消费社会中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物—功能”的对应结构，不再局限于特定的价值或意义，即原有的特定使用价值。这也就使得为商品赋予其原本不具有的其他符号价值变得更为容易，引导甚至操控这种编码行为也更为可能。由此，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价值得以凸显，消费者所关注的不再是商品的价值，即其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甚至不关心其具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执着于对这种符号价值的占有来满足自身的某种身份、地位的追求及并非真实的消费需求。符号价值成为商品最重要的“二次度功能”（secondary function），即“对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进行象征性或符号性意指的功能”^③。因此，物品在其内涵领域“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了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④。商品的使用价值此时也不再是由具体劳动所赋予，而变成了一种鲍德里亚所谓的“抽象的社会需求力”的表征。

最后，消费主义盛行使得劳动观念日益式微。随着劳动者地位的衰落以及劳动创造价值的经典命题被质疑，对劳动社会价值的认可就会动摇，而消费主义的横行无疑加剧了全社会范围内劳动意识的式微。在消费社会中，当以非理性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流行时，其必然伴随着对于物质、金钱

①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77页。

②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4-86页。

③ 荣鑫：《从生产到消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历史性反思》，《北方论丛》2014年第1期。

④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的崇拜以及享乐主义的兴起。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网络游戏、主播文化和娱乐节目的无节制发展与传播等”,无疑加剧了这种趋势,使得人们的“消费认知和价值观遭到单向度、片面化甚至扭曲式的发展”,^①饭圈文化的持续、“网红”梦的泛滥都是这种现象的表征。因此,消费社会也更易滋生不劳而获、好逸恶劳的社会认知,使得人们的劳动观念日益淡化,厌恶甚至轻视劳动,脚踏实地的劳动不再被赞扬,“走捷径”成为人们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为一种获得物质利益、满足消费需求甚至是规训惩罚的工具。由此,“劳动最光荣”的观念逐渐衰落,“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很难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生信念,劳动的人文意义、教育意义及其内在价值也随之被忽略。不可否认的是,劳动观念的衰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失、分配制度的不完善都可能会动摇人们对于劳动价值的认同与坚持,但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无疑从外部加速了劳动观念的瓦解。

二、消费社会的本质与人的双重异化

消费社会中劳动地位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表征,但消费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生产社会,或者说二者究竟是否为两种完全异质的社会形态仍然需要进一步澄清。与此同时,对消费社会的本质追问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身处其中的人的境况,特别是人的消费行为与劳动行为的理解。换言之,如果消费社会是生产社会的某种延续,那么符号消费主导下的消费社会看似为人提供了更加丰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可能,但事实上可能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阻碍人全面发展的劳动异化或消费异化问题。

1. 消费社会:生产社会的升级

“消费社会”经常与“生产社会”作为一对概念一起出现。随着消费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般认为现代社会已经从生产社会过渡到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曾指出,“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②。与之类似,大卫·理斯曼也曾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判定了从生产时代到消费时代的社会转型。^③齐格蒙特·鲍曼也曾把人类社会分为“生产者社会”和“消费者社会”两个发展阶段。^④而美国学者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也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出发将人类社会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或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⑤五个发展阶段。曾有学者专门对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特征进行过比较,认为生产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匮乏阶段;以生产为原则,是匮乏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是整个社会建构的指挥棒;以生产为目的,消费只是为了生产,消费主要是消费物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消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富足阶段,是富足的阶段;以消费为原则,是富足社会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制造消费、引导消费中建构起来的;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目的的。^⑥克劳斯·奥菲甚至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消费者’概念是毫无意义的”,“‘消费者’概念没有其明确的社会现实基础。因为,与消费相关的行为还没有从其他行为(如工作、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只有在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随着行动体系的分化,才有可能相对清楚地划分出‘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工人、选民和户主等”^⑦。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经济结构、政治与阶级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维度对生产社会与

① 宋岭、张华:《时代挑战与未来路向:劳动教育的当代诠释与实践》,《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0年第2期。

②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③ 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王崑、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④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7页。

⑤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页。

⑥ 张天勇:《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符号拜物教的现实根基》,《学术论坛》2007年第3期。

⑦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消费社会进行过区分。^①

无论如何,“消费社会”这一概念是对当下物质相对丰裕、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以及人们越来越关注消费等社会现象的一种敏锐把握和概括,消费社会也逐渐借助其自身在学术界与社会生活中的传播成为一种具有“似客观性”的社会现实。但这种“似客观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仍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以某种社会表征作为划分标准的判定方式必然带有明显的历史经验主义色彩,“把历史过程解读为经验现象层面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或消费结构的发展过程,那么,一旦碰到像福特制资本主义、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等新的经济现象,就必然会因为从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中看不到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可能性,而最终放弃历史发生学的解读方法”^②。因此,对于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的关系分析而言,历史的视角是必要的,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重新解读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关系。

从外在表征来看,消费社会中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消费的伸张与生产的相对隐匿。但究其根源,消费社会必然不是从天而降或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生产不断积累的基础上,生产的隐匿绝不意味着生产的消失,反而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表征。在生产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精细化,生产的隐匿恰恰是生产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聚集的结果,即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生产隐匿必然伴随着后发展地区的生产的聚集。在此意义上,表征上的“生产的终结其实是普遍生产时代到来的强烈宣告”^③。同样,消费社会中消费从大众化到个性化的趋势也必然是生产从标准化到灵活化的结果。从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的运行过程来看,与生产社会所面临的情况一样,消费社会中“由消费带来的社会操纵正是资本力量极权主义专制的象征,消费社会仍在资本所有权的框架内运行,始终摆脱不了利润的引诱和最终的驱动”^④。因此,消费社会中的资本运行逻辑与其在生产社会中是一致的,只不过资本的控制从生产领域更多地进入文化领域。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消费被异化为迎合虚假欲望的工具,而这种异化也是生产领域中异化的一种“延伸”,只不过是有一种更加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循此,现代社会虽然确有“消费之实”,但究其本质仍然未脱离生产社会的逻辑,与其说“消费社会”是一种异质于生产社会的全新形态,不若说是由资本与权力所构建起的一种更隐秘的、更符合其运行逻辑的现实话语。

因此,从人的境况来看,“消费被提升到与生产的同等地位,也丝毫不足以表明社会的极大丰裕、人性的真实解放,抑或人们走出了生产时代”^⑤,在以符号为主宰的社会中,人甚至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问题。

2. 消费社会中人的双重异化

即使如前文克劳斯·奥菲所言,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是“行动体系的分化”的产物,但这种行动体系的分化依然是建立在生产社会的基础之上。而且即便是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也不必然是独立于生产者的存在,而只能是一种身份。换言之,消费社会中的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消费者,而这种身份的叠加对于消费社会中的人而言更多的意味着异化境况的叠加。

一方面,消费社会中的人依然面临着劳动异化的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提出“异化劳动”及其四项规定,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在消费社会中,异化劳动问题并没有随着物质的丰裕而消解。首先,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活动依然并非人的类本质的体现,而成为某种服务于消费需求或消费欲望的必要条

① 董敬畏:《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当代中国实践的阐释》,《桂海论丛》2014年第4期。

② 唐正东:《“消费社会”的解读路径:马克思的视角及其意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观的方法论缺陷谈起》,《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

③ 荣鑫:《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思想及其当代反思——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误读说起》,《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④ 张聪卿:《现代社会:生产之质还是消费之实?》,《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⑤ 李恩来:《生产与消费的颠倒——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批判逻辑》,《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2期。

件,被刺激或制造的消费欲望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劳动的目的。其次,劳动者依然被自己所生产的商品所奴役,而且这种奴役的掌控者不仅是商品本身,更是商品所承载的符号价值。正如前文所述,在消费社会中物呈现为“零度”状态,使用价值让位于符号价值。由此,商品的剩余价值仍然不归劳动者所有,而这套符号系统显然并不为生产者或劳动者所掌控,其符号价值也不归劳动者所有。再次,人的类本质依然是异化状态。在消费社会中,当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成为劳动的目的时,人的类本质特征被消费所主宰或控制的风险明显加大。最后,由于资本逻辑依然主导着生产过程,人与人的异化依然存在,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我及他人的关系依然不是同“类”的存在。

在消费社会中,由于商品的价值已然脱离了具体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而被符号体系所控制,生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确证这种符号体系的工具。在鲍德里亚看来,“受符号绝对操控的劳动挣脱了与工资的等价关联,劳动不再是生产工具,而是生产对象,一种劳动符号”,“它像其他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他一切领域相互替换。它被不折不扣地‘异化’,不再是孕育特定社会关系的特殊历史‘实践’的场所”。^①在这种境遇中,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作为“失败的消费者”的劳动者,不仅仍然遭受着来自资本的利用与剥削,甚至还处于某种被驱逐、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另外,那些非生产性劳动也被降低为“劳动—服务”,即“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供赋’”。^②

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中的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消费异化问题。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在流通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工人认为自己是处于平等交换关系中的消费者的错觉,但这种平等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在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交换关系之外”^③,即这种交换并非以使用价值为基础。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想法阐释为“拜物教”,“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④消费原本是人延续生命的消耗的过程,以满足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在商品拜物教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了颠倒,人与商品的关系也被异化,原本作为满足人的真实需求的商品(使用价值)转而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成为人的主人,人被物(交换价值)所奴役。

而在消费社会中,这种拜物教成为一种更为隐秘的符号拜物教。与传统的拜物教所指向的“虚幻形式”,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同,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拜物教已经渗透进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⑤换言之,使用价值也被纳入符号体系之中,此时的拜物教“所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它控制了物与主体,使它们屈从于它的编排,将它们的存在抽象化”^⑥,物体系所承载的符号由此实现了对于人的控制。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形成了某种诱惑关系,即通过华丽的、令人炫目的展示,商品在高超的美学和心理学技艺的结构化广告中,在昭示着地位和成功的品牌诱惑之下,生成了炫耀式的景观表象。这实际上是对人的深层心理筑模的下意识统治和支配。这种支配是一种商品之间的“暗示意义链”,即当消费者购买一款高档产品时,与之同层次的商品便会形成欲望诱惑链,建构“一串意义”。与此同时,物体系通过自

①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9-10页。

②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⑤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0页。

⑥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106页。

身内部的差异性使诱惑成为一种“勾魂术”，即刺激消费者通过占有符号或象征性商品来确认自我的身份乃至自我的存在。进言之，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本质上也就成为一种符码之间的交流体系，人们通过符号获得特定的认同，“一旦人们进行消费，那就决不是孤立的行动，人们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不自主地相牵连”^①。由此，消费社会中的人被符号体系所奴役，消费者看似作为理性选择或自主选择的消费行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控制的结果。在这种消费异化中，主体拥有更多的自由或自主，甚至看似出现了某种异化的消解，但这种自主背后依然是对于物的依赖，对于符号价值与象征价值的向往。事实上，异化并没有消失，只是以某种看似更加自由、实则是更为隐秘、严格与全面的符号体系继续存在。与传统的拜物教相比，消费社会中拜物教不再是对于“物”的崇拜，而是将物以及物体系所建构的符号神圣化，形成一种新的“符号拜物教”。

三、劳动教育对消费社会劳动危机的回应

消费社会中的劳动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异化。无论是劳动异化还是消费异化，消费社会中人所面临的异化问题都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消费社会非但没有因其丰裕的物质减轻人的异化境况，反而因为消费者与劳动者的双重身份面临更为严重的双重异化。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及其批判理论中，当符号消费成为主导时，依靠消费本身解决异化问题不再可能。因此，想要真正解决异化问题、寻求人类的解放，我们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重新理解消费与人的关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寻找人的类本质得以真实确立的基础。

1. 劳动教育的核心任务：劳动而非消费才是人的类本质得以确证的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是人类的首要目标，“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②，“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③。换言之，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性。对于人而言，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就是消费，消费的目的就在于满足需求。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消费主要是指对劳动者主体生命力以及作为生产客体的生产资料的消耗过程，即主体利用客体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实现自我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与物质前提，成为完善人性、促成人的发展的手段，从而为其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提供了人性依据”^④。因此，在正常的需求支配下的消费行为是符合人的生存、生活目的的。

但需求之于人的规定性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原因在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虽然发展出了比其他动物更加高级的需求，但也保留着一部分作为动物的生存性需求。即便这种需求差异也是“待规定”的，即这些需求并不能自我说明，而是需要寻找它产生的更深刻的根源。那么是什么将人与动物彻底分开呢？答案是实现这种需求的方式。动物满足需求的方式是对自然的消极适应或占有，是本能的无意识活动，但人类则依靠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进行了界定，“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⑥。而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正

① 张一兵：《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

④ 洪波：《需要、消费与人的本质——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的分析》，《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是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过程中、在积极实现自身存在的过程中所从事的生产劳动。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将物质生活生产界定为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与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得以确证,“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社会关系“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①

需求与生产劳动对于人类本质乃至人类社会的不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消费与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同时也决定着对于人的异化的根本性解决方案在于劳动而非消费。在将物质生产界定为“第一历史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②。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③。即便鲍德里亚强调了消费的巨大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消费会受到生产以及生产周期的约束与支配。

因此,当消费受制于生产时,解决人在消费社会中所面临的异化问题的方式自然不在消费自身之中。更何况消费社会中人的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为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消耗行为,也不再是人正常的存在方式。在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消费社会的出现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结果。换言之,“消费社会”作为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或概括,也必然会伴随着生产力继续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消亡。从人的本性来看,人类天然倾向于喜欢消费却抗拒生产,但也正因如此,从事劳动意味着人类克服这种本性,向人应然的存在方式迈进。“个体生产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是对个体与群体有利益贡献的,利益贡献是无限的并永远正义”,而“个体的任何消费行为都必须谨慎而行,利益消费是有限的并永远是非正义的”。^④在此意义上,非异化的劳动作为人类本质的确证性力量,依然是对抗异化的关键手段。

2. 劳动教育的具体要求:凸显劳动价值观教育

当聚焦于人的本质以及劳动所具有的对人的本质的确证性力量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消费社会中劳动地位下降的问题。质言之,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轻视劳动的现象本质上是资本与符号成为主宰力量的一种病态表征,其非但不能从本质上动摇劳动之于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地位,反而还要依靠劳动来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寻求人的真正解放。因此,如何帮助当代青少年正确认识劳动、认识劳动者、认识劳动成果之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为消费社会背景下劳动教育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实际上也就凸显了劳动价值观教育在当代劳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具体而言,消费社会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观教育,需特别重视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坚定唯物史观,重申劳动的历史价值。消费社会中对于劳动的忽视或轻视固然是由消费成为社会的某种显性特征所造成的,但同时也来自人们对劳动的价值的忽视或遗忘。因此,消费社会中的劳动教育的首要任务便在于重申劳动之于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价值。

从人类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劳动在人类产生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曾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人手的肌肉、韧带甚至骨骼在劳动过程中发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④ 邹广文、王纵横:《马克思的消费社会观初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4期。

生的变化,而随着手的操作的不断精细化,人类开始制造并使用工具,逐渐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关键一步——直立行走。而随着人类集体劳动的出现,语言也“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①在语言和劳动的推动作用,大脑的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不断提升,猿脑就逐渐变为人脑,同时,“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②。正因如此,恩格斯做出了“劳动创造人”这一科学论断。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劳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衣、食、住等生存需求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在此过程中,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方式逐渐精细化,人类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劳动联系日益密切,群体组织形式从氏族部落逐渐发展为民族直至国家。而劳动产品的剩余也使得人类发展科学、艺术、宗教等高级意识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而“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④商品作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人类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文明成果也大都来源于生产劳动。比如,舞蹈、绘画等艺术形式的早期形态都与人类的劳动有关,目前已经发现的原始人的壁画以及其中的舞蹈场景就是例证。同时,许多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以及诗歌等文学作品也是在劳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因此,正如经典作家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⑤。对于劳动价值的认识必须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整个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过程中准确把握劳动之于人的意义与价值。

其次,聚焦人的本质,明确劳动的现实意义。对于劳动教育而言,重申“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历史”之所以必要,不仅是因为劳动之于人类的历史价值,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价值在当今时代仍然存在。时至今日,劳动依然发挥着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性力量,因而劳动教育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劳动的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实现的过程,人在劳动中创造并确证自己。“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劳动是一致的。”^⑥人的本质的实现需要通过对象化的活动才能实现,而劳动就是这样一项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人通过对象化的世界反观自身,同时也进行自我创造,并以此来获得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根本特征,即价值感和意义感。^⑦与此同时,劳动也是人的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劳动本身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⑧。人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物质需求,也包括在劳动中体会的满足、快乐等精神需求。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将从劳作,或者说是为了谋生的劳动中不断解脱,彼时“劳动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劳动就像娱乐和个人才艺分享等其他创造性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8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⑦ 班建武:《“新”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活动一样,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活动”^①,甚至劳动本身也将逐渐成为某种娱乐。

当然,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当今时代的劳动依然面临着异化的风险。即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的体脑分离、劳动分工固化、谋生性等非自觉的劳动以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导致的劳动异化风险加剧等问题也依然存在。在此情况下,聚焦于人的本质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劳动教育就显得尤为迫切。诚然,劳动教育所指的“劳动”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其必然需要按照教育逻辑的“裁剪”才能在教育中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校中与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劳动世界。劳动教育的开展必须以现实的劳动世界为基础,为学生未来从事劳动、成为一名真正的“劳动者”做准备,否则必然会受到实效性与时效性的诘问。在此意义上,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也应当是一种人的类本质的确证性力量。也只有如此,劳动才有可能确证其自身的教育价值,真正让劳动成为教育。正如有研究指出,“专门开展劳动教育的根本理由不是缺少具体劳动素养的问题,而是这些具体劳动素养缺乏和不足背后折射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②。劳动教育本质上作为一种教育,“育人”是其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即培养具有劳动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应当是劳动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劳动教育作为教育实践从一开始就应当首先聚焦人的本质,明确劳动对于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占有与发展,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帮助他们做好面对真实劳动世界的准备。

最后,注重时代特征,直面消费社会的挑战。在消费社会中实施或加强劳动教育不是对客观形成的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抗,重申劳动的历史价值、明确劳动的现实意义也并不是在劳动教育中人为制造劳动与消费的对立。一种好的劳动教育必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时代特征的适应与超越。因此,立足消费社会的时代特征,劳动教育理应直面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与挑战。

第一,处理好劳动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消费为人类提供了改造自然乃至改造自身的基础和条件,是人类自身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一种理性的、合乎人的本质需求的消费非但不会带来人的异化,反而能够成为促进人本质实现的推动力量。因此,劳动教育在伸张“劳动光荣”的同时不能因为反对消费主义而宣扬“消费可耻”。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来看,在承认生产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的是同时不能否认消费所具有的客观反作用,“生产与消费本就是一个完整劳动链条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要素”^③。因此,从劳动教育的内容来看,劳动与消费一体两面的关系本身就意味着劳动教育中应当内含着消费教育,即帮助学生形成对消费的正确认识,养成科学理性的消费习惯。这种消费教育应当既包含对消费社会中符号消费对人的控制、异化的本质的揭露,也应当包括对那些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澄清与提倡。

第二,树立一种发展的劳动教育观念。消费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在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不断丰裕,而且这种趋势必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逐渐扩大。在此情况下,如何培养学生适应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劳动素养以及如何引导物质丰裕后学生的劳动需求就成为劳动教育不得不面对的时代问题。因此,应当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与实施劳动教育。一方面,在新兴技术不断涌现、传统产业急剧变革的今天,单纯的体力劳动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的发展对新时代的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目标上看,劳动教育不但应当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劳动技能,更应当培养学生与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相匹配的劳动素养以及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物质丰裕意味着教育需求的转变,人们从过去的“‘饥饿逻辑’的控制中逐步摆脱出来,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去追求修身养性、安身立命、实现人生梦想等教育的本体性价值”^④。因此,从功能上看,劳动教育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帮

① 宋岭、张华:《时代挑战与未来路向:劳动教育的当代诠释与实践》,《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0年第2期。

② 余清臣:《当代劳动的异化风险与现代劳动教育的应对》,《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③ 班建武:《“新”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檀传宝:《发展范式转型的意味——论“2019年以后”的中国与中国教育应有的变革》,《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8期。

助人获取生产物资进而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通过劳动认识、劳动体验以及劳动创造来满足人的自我价值彰显以及自我意义实现的需求。

第三，加强对劳动形态变化的关注与研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社会中出现了“信息化、数字化的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共享劳动等”^①许多新的劳动分工或形态，而对于这些非物质劳动的价值辨析将随着劳动形态的继续细化和复杂化变得更加困难。再比如，电商平台开发、网络直播、发帖打榜、游戏陪玩等数字劳动，这些新的劳动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休闲消费的特征。在此意义上，传统的劳动与消费的边界逐渐模糊，关于这些劳动形态，或者说类似的消费行为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争论。^②与此同时，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以及现实增强（AR）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的劳动与机器的劳动更深度地融合，这也必将导致劳动的形态更加复杂，对不同劳动形态的本质分析或价值分析也将遇到更多挑战。在此意义上，一种适应劳动新形态的劳动教育必须更加关注这些新的趋势或特征，拓展传统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边界，对这些新的劳动形态形成科学、准确的认知。

结 语

对于消费社会中的劳动教育而言，最大的挑战首先在于怎样认识劳动以及劳动的价值。消费社会作为现代生产发展的产物，其本质上并没有跳出生产社会的根本逻辑。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批判固然更贴近现代生活，但其批判逻辑与解决方案也未能实现对经典作家的本质超越。因此，劳动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于澄清劳动对于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价值，特别是在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当今社会中劳动仍然具备的本质力量。在此意义上，劳动教育首先应当是劳动价值观的教育，“唯有努力完成劳动价值观教育这一任务，劳动才能成为一种具有‘教育性’的活动”^③。更重要的是，劳动价值观教育并不仅仅是“劳动光荣”“劳动重要”等口号式的宣扬或价值观的灌输，更要回答在当今社会“劳动为什么光荣”“劳动为什么重要”的时代问题。

责任编辑：张利明

① 肖绍明、扈中平：《新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和可能》，《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② 谢富胜、邓可为：《“劳动新形态”价值创造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③ 檀传宝：《如何让“劳动”成为一种“教育”？——对劳动与劳动教育的概念之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6期。